

外国文论核心集群理论旅行问题研究

——第2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进 周启超 许栋梁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论核心集群理论旅行问题研究

——第2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进 周启超 许栋梁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论核心集群理论旅行问题研究:第2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进,周启超,许栋梁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203-1795-5

I. ①外… II. ①张…②周…③许…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369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湑
责任校对 刘 同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17ZDA27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
项目编号：17ZDA282

编者序

2016年正值鲍里斯·艾亨鲍姆诞辰130周年、罗曼·雅各布森诞辰120周年、“诗语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建立90周年。为汇聚和展示现代斯拉夫文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推进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跨越发展，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联合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承办的“第2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研讨会”于6月25—26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8位外籍专家分别来自俄罗斯、美国、瑞士、波兰、爱沙尼亚、捷克、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内专家则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30余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家科研机构，以及多家知名期刊和多个重要学会。在开幕式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进教授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及参会嘉宾。之后，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代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代表中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张永青教授代表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和莫斯科大学奥列格·克林格（Oleg Kling）教授代表国内外专家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契机、现实价值和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以“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旅行”为主题,共进行了3个主旨报告和3场大会发言,30多位专家分享了他们关于现代斯拉夫文论名家名说与学派集群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会学者围绕报告和发言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会议取得了全方位的丰硕成果。

一 现代斯拉夫文论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宏观研究

不管从现代文论史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还是从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都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典型,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内涵。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教授的主旨报告以雅各布森的跨国别、跨语言学术活动和跨学科、跨领域理论传播,以及“陌生化”概念学说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转、译介和变异两个经典案例,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和系统的论证。

现代斯拉夫文论作为集群规模宏大、理论特色鲜明的现代文论体系,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和丰富的历史语境。在此次研讨会上,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从宗教的角度切入,认为现代斯拉夫文论以文学意义为中心和本源,以意义、语言和形式三位一体为诗学深层逻辑,特色鲜明的个性化话语等特点,都有其内在的东正教渊源。波兰格但斯克大学的日尔科·博古斯拉夫(Zylko Boguslaw)教授追溯了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主要流派的历史渊源,系统考察了这些流派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历史语境的关联,并通过一种类型学的比较研究,详尽论述了几个主要学派的行动脉络及相互之间的学术共鸣与争鸣。

作为跨文化旅行的典范,现代斯拉夫文论对中国文论和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既有源于理论的内涵特质,也有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现实机制。此次研讨会上,周启超教授从中苏、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出发,提出了当代中国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接受的三个阶段划分,并概括梳理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则站在历史影响的角度,从思维方式和体系建构、重要范畴、研究方法论三个方面来考察苏联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建构的重大影响,并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及其理论实践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梳理和比较印证。

二 史料的再发掘与理论的新视野——雅各布森研究的创新性突破

雅各布森作为现代斯拉夫文论跨学科发育、跨文化旅行的典型案例，是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聚焦点和重要创新点，国内外专家从不同维度展示了关于雅各布森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历史视野与理论视域相交融的特点。

20 世纪很多理论家都在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展开学术活动，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学者，雅各布森的个人身份、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问题是雅各布森研究的关键问题。此次研讨会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教授的主旨报告就雅各布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的间谍身份和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报告通过大量翔实的文献档案资料展示和细致的历史线索分析指出，雅各布森在布拉格期间与捷克、苏联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往往自相矛盾，其中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纠葛。瑞士苏黎世大学托马斯·格兰茨（Tomáš Glanc）教授的主旨报告则通过对《论民族自决》和《欧洲民族自决的兴起》这两个关键文本的发掘探讨了雅各布森的民族意识问题，报告深入解读雅各布森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及其历史文化环境，进而从一种“知识和概念的转移”的视角，指出雅各布森作为传播斯拉夫文化并致力于沟通俄欧、俄美的“中间人”，有其民族文化“野心”。

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纵向传承和横向拓展具有枢纽式的作用，历来为学界所重，也是现代斯拉夫文论研究创新所需突破的主要难点之一。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或从新视野、新视角观照切入，或进行概念的新解读与新发现，或挖掘其学说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创新成果丰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进教授从范式论的宏观视野出发，考察雅各布森诗学核心观念的“他域化”“他人化”“他国化”“他语化”和“他科化”典型特征，以一种“观衢路”的路径来探讨雅各布森诗学“他化”的重大理论和历史意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开举教授从方法论批判的视角切入，认为雅各布森将文学置于语言学的视野下进行科学化研究，实现方法论突破的同时也凸显了这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五邑大学杨建

国副教授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观照雅各布森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理论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进行了类型划分和历史分期，自身也成为“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安庆师范大学江飞副教授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视角考察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意义的思考，反思雅各布森与结构主义阵营之间关于读者阐释与语言阐释的批评与反批评。黄冈师范学院胡涛副教授从理论接受的视野出发，质疑当下流行的“文学性”概念的接受程度，指出在汉语中的广泛使用与新时期引入西方文论时的选择性误读有关。

国内关于雅各布森诗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整体看来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雅各布森著作的翻译。对此，北京语言大学刘丹教授详细考察了雅各布森诗学著述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以译介学为理论参照，对雅各布森诗学译介不成系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探析并提出了潜在的研究领域。

三 对话的历史——现代斯拉夫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多维度考察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话和历史纠葛，除了理论价值取向和运思路径的分歧，背后还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因素。此次研讨会会有两位国外专家都从“列宁语言”与形式的关系入手来考察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斯蒂芬尼亚·希尼（Stefania Irene Sini）教授聚焦1924年形式主义者关于“列宁语言”研究的系列文章，认为这些文章反映了形式主义者理论的演变，也是其研究疆域的拓展，揭开了他们进行文学形式之外的日常生活研究的序幕，实际上是形式主义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伊利亚·卡列宁（Ilya Kalinin）副教授则聚焦形式主义学者对历史材料与意识形态手法的研究，认为形式主义学者从发掘诗学语言规律的角度来描写列宁语言，这为其将文学演化理论向整个社会历史领域推广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形式主义学者也开始着手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分析。

除此之外，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通过对代表性文论与美学著述的分析，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奇对形式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与吸

收。山东大学杨建刚副教授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学术论争。昆明理工大学杨磊副教授则考察了布拉格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认为在对话的过程中布拉格学派的社会关怀被进一步激发而走向了一种艺术实践论。四川大学高树博副教授则考察了穆卡洛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鸣,认为穆卡洛夫斯基可视为“后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其思想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很有启发意义。

四 渊源·演化·影响——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史的系统性观照

俄苏形式主义作为现代文论的主要开端之一,其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但其产生并非一蹴而就或完全自主的。对于形式主义发生时期的界定,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奥列格·克林格(Oleg Kling)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提出安德烈·别雷是“形式主义前的形式主义者”,应该以其在1902年发表的《艺术形式》一文作为俄苏形式主义的起点标志。关于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渊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教授则全面考察了其与索绪尔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并从肯定价值与反思批判的双重维度进行了客观的评析。

形式主义文论的贡献,还可以在整个现代文论历史演化的轨迹中得到系统性的定位。在此次研讨会上,爱沙尼亚塔尔图/塔林大学教授、著名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之子米哈伊尔·洛特曼(Mihhail Lotman)以诗文本理论为核心线索,梳理了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并指出诗学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范式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进而分析结构主义对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和修正,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超越性意义。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被接受程度实际上代表着形式主义文论的历史影响力。在此次研讨会上,哈尔滨师范大学赵晓彬论证了什克洛夫斯基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灵魂人物,并进一步阐述其理论对该团体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共同诉求。哈尔滨师范大学杨燕副教授则指出了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被误读之处,认为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学基础并非索绪尔语言学,而是库尔德内的语言学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总体的人文主义倾向往往被学界所忽视。

五 从概念、学说到流派历史的考察——布拉格学派研究的多层次推进

此次研讨会关于布拉格学派的研究，除了聚焦雅各布森之外，还在多个层次上得到推进。大连外国语大学曲长亮副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综合考察雅各布森提出的聚合性的“区别特征”概念和布拉格学派对这一概念的整体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朱涛副教授从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角度切入穆卡洛夫斯基的文艺符号学思想，详细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于艺术作品的决定性作用。

北京大学钱军教授探讨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历史分期、成员构成以及与欧美语言学者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历史问题，认为布拉格学派不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或者俄国形式主义的捷克翻版，也非地理或民族的概念，同时也不是封闭的团体。关于布拉格学派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处境问题，捷克科学院昂德瑞·斯拉迪卡（Ondrej Sládek）教授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认为其间布拉格学派的活动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布拉格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是捷克学术界的中心之一，这对于捷克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乃至捷克语言学、文学批评、美学和戏剧研究的持存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六 比较视域与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名家名说研究

此次研讨会除了聚焦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洛夫斯基之外，还从比较视域与当代视野等角度出发，对巴赫金等现代斯拉夫文论名家及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巴赫金研究也是此次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凸显出从多科学、跨领域对其思想进行综合考察的总体特点。复旦大学汪洪章教授认为，思想成熟时期的巴赫金已实现由美学研究向文化哲学研究的转变，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消解主体性的人文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张冰教授则将巴赫金的话语诗学溯源至沃洛希诺夫的“社会学诗学”，认为其话语诗学将日常生活话语纳入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转变意义。浙江传媒学院杨向荣教授阐述了巴赫金从美学角度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指出巴赫金认为“科学”的诉求使文学研究简单化和绝对化，也导致了审美的

遮蔽。

关于洛特曼的研究，中山大学王坤教授从同一性的弊端出发来论述洛特曼对立美学的当代意义，认为其对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化解具有重大的价值；武汉大学郑文东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视角来观察来观照翻译学。此外，黑龙江大学孙超教授对俄罗斯当代文学批评家叶兴的《分析文学作品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认为该书为认识作品的“文学性”开辟了一个明确的思路。苏州大学李冬梅副教授对艾亨鲍姆的文学系统观进行了细致阐述并指出其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康澄教授对普希金诗学中作为“情节基因”的象征进行了研究，分析其象征的基础性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萧净宇教授则考察了俄国语言哲学代表人物施佩特的斯拉夫思想印记及其对于俄国诠释学现象学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孙烨从蒂尼亚诺夫的“二律背反”思想来考察形式论学派的理论贡献。另外，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阐发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宁副教授运用普洛普的理论来质疑对印第安神话《波波尔·乌》由印第安人族群自主创作的观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璐副教授则综合普洛普、格雷马斯、巴赫金等人的理论模式来探索《搜神记》的叙事模型和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此次研讨会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议题合理，内容全面，囊括了现代斯拉夫文论主要的理论家和学派集群。与会专家研究视角全面，既有宏观审视，也有微观聚焦；会议创新成果丰硕，既有历史的探新发掘，也有理论的重评再估；会议研讨充分，既有研究热点的聚焦，也有研究难点的突破。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国内外专家对话交锋，中英俄三种工作语言交会贯通。在闭幕式上，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会长周启超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进教授分别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会议于6月26日中午结束。

此次会议共征得高水平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经大会学术委员会审定，征得论文作者同意并授权，现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以飨学界。同时，在编辑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还请论文作者及学界同人海涵指正。

目 录

编者序	(1)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布拉格

语言学小组	[捷克]昂德瑞·斯拉迪卡(1)
安德烈·别雷:形式主义之前的形式主义者	[俄罗斯]奥·克林格(11)
究竟站在哪一方?	

——罗曼·雅各布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布拉格	[美]彼得·斯坦纳(22)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雅各布森诗学方法	陈开举(31)
印第安神话《波波尔·乌》的形态学解读	陈 宁(42)
雅各布森与“文学性”概念	胡 涛(53)
文学意义的生成:重审雅各布森与里法泰尔、卡勒之争	江 飞(67)
论鲍里斯·艾亨鲍姆的文学系统观	李冬梅(86)
雅各布森诗学在中国的译介现状及研究潜势	刘 丹(100)
诗学理论:从形式论学派到	

后结构主义 [爱沙尼亚]米哈伊尔·洛特曼(111) |

布拉格学派与亚音位实体之确立

——多语文本中的早期区别特征概念 曲长亮(116) |

20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学派:

比较研究 [波兰]日尔科·博古斯拉夫(125) |

“列宁的语言”:疆界的保卫、划定和拓展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面临选择…… [意大利]斯蒂芬妮娅·希尼(129)

形式论学派的“相对性诗学”

——蒂尼亚诺夫理论思想特征初探…………… 孙 烨(140)

民族自决、其前提和影响:论知识和

观念的传播…………… [瑞士]托马斯·格兰茨(155)

巴赫金论小说的勃兴与西方主体性的衰落

——从吉哈诺夫关于巴赫金研究的一篇文章谈起…… 汪洪章(158)

洛特曼与当代文论新视角…………… 王 坤(177)

学术批评抑或政治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及其反思…… 杨建刚(184)

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理论和审美现代性话语…………… 杨建国(201)

走向艺术实践论的布拉格结构主义

——布拉格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杨 磊(215)

舍斯托夫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 杨婷婷(228)

科学诗学建构中的审美遮蔽

——巴赫金对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 杨向荣(236)

列宁的语言是怎样形成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论历史材料与

意识形态手法…………… [俄罗斯]伊利亚·加里宁(248)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索绪尔语言学的联系…………… 张 弛 方丽平(255)

理论“他化”与雅各布森诗学的范式意义…………… 张 进(267)

《搜神记》志怪故事中的叙事模型及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张 璐(279)

文化互动中文本的对话机制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观察…………… 郑文东(291)

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的现代斯拉夫文论…………… 周启超(300)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的中国之旅

——以“陌生化学说”为中心…………… 周启超(314)

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

——扬·穆卡洛夫斯基文艺符号学思想初探…………… 朱 涛(330)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捷克]昂德瑞·斯拉迪卡(Ondřej Sládek)著 许栋梁译

(捷克科学院捷克文学研究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将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拉格语言学小组(PLC)的艰难处境。尽管出版发表的可能性降低,战争前期审查机制加强,但是小组的活动大体不变:会议和演讲活动持续举行;《语言与文学》(*Word and Verbal Art*)一直发行至1943年。但是在1944年小组的活动明显衰落。大体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是捷克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学术活动中心之一,多亏于此,V.马泰修斯、扬·穆卡洛夫斯基、博胡斯拉夫·哈弗拉奈克、尤里·维尔特鲁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卡利其卡等人的一些重要个人著作,以及《马哈作品节选和探秘》(*The Fragment and Mystery of Mácha's Work*)、《语言和文学读本》(*Reading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集体著述得以出版。这些著作对于捷克结构主义重要传统的持存起了意义重大的作用,并且对捷克语言学、文学批评、美学和戏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还聚焦于穆卡洛夫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及其当时发表的著述之梳理。

一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新处境

英语语言学家约瑟夫·瓦海克(Josef Vachek)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通常认为,由于1938年6月特鲁别茨柯依的逝世和1939年春雅各布森被迫移民,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业已瘫痪。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小组的演讲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在德国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小组成员只要条件允许，就抓住有限的可能性持续发表著述。”（1994：80）。这份由约瑟夫·瓦海克在他的《一个捷克英语语言学家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Czech Anglicist*, 1994）所提供的证言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证实。我们可以考察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演讲列表，或者我们可以查阅一些小组集体或由成员个人撰写并在那个时期成功出版的著作（cf. Čermák-Poeta-Čermák, 2012; Sládek, 2015）。

瓦海克在引文中提到，一些专家认为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的逝世和罗曼·雅各布森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对此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说，使小组活动陷入停滞。瓦海克明确意识到，这种观点是源于对布拉格学派的浮浅认识，由此，同样会认为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各布森是布拉格结构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同时还有一种广泛流行迄今的观点，那就是认为雅各布森的离开事实上意味着小组的终结。对此我们可以援引英国批评家、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引》（1983, 2nd ed. 1996）中的论述来阐明不一样的情况：“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建立于1926年，持续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003：85）

当我们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面来看待瓦海克的上述评论，很明显直接谈论的是成员变迁与小组活动之间的关联。瓦海克指出，很多学者认为特鲁别茨柯依的离世和雅各布森离开之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一定程度上便解体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离开”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小组已经无法一如从前了。事实上，小组成员的变迁更早就开始了——现代捷克文学批评的领军人物弗兰蒂谢克·萨尔达（František X. Šalda）已于1937年逝世；同样地位显赫的捷克文学批评家奥托卡·费舍尔（Otokar Fischer），于1938年初在得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就去世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整个期间小组发生了更为致命的成员变迁。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将其变成受保护领地之前，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共有60名成员（Čermák-Poeta-Čermák, 2012：372）。犹太裔德国语言学家利奥波德·希伯斯坦（Leopold Siber-

stein), 在 1938 年初离开了小组, 不久之后伟大的纳粹主义反对者弗里德里希·施洛蒂 (Friedrich Slotty) 也离开了。不同的情况是德国音乐学家古斯塔夫·贝京 (Gustav Becking) 因追随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NSDAP, 纳粹党的全称) 而离开小组, 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布拉格街头被秘密处决。同样, 德国斯拉夫语学家尤根·瑞普尔 (Eugen Ripple) 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选择了和他妻子一起自杀。德国美学家埃米尔·乌蒂茨 (Emil Utitz) 和德国法学家兼哲学家奥斯卡·克劳斯 (Oskar Kraus)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羁押在集中营。俄国文学史家和理论家阿尔弗莱德·贝姆 (Alfred Bem) 于 1945 年 5 月被苏联军事情报局逮捕, 此后杳无音讯。

这个并不全面的关于成员变化的简短考察表明,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严重影响。尽管如此, 小组剩余的成员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捷克境内的大学于 1939 年 11 月 17 日关闭之后,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很多论述都认为, 小组自然地应对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扬·穆卡洛夫斯基 (Jan Mukařovsky) 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 “每当时局越艰难, 我们的会议就更有生命力” (Mukařovsky, *Vzpomínky II / Memoirs II /*)。

小组在失去一些成员的同时也在吸纳新的成员。约瑟夫·鲁茨卡 (Jozef Ružička)、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Jaroslav Průšek)、尤里乌斯·海登瑞希 (Julius Heidenreich)、约瑟夫·瓦西卡 (Josef Vašica)、亨德里奇·霍恩泽尔 (Jindřich Honzl)、菲利克斯·沃迪奇卡 (Felix Vodička)、尤里·维尔图斯基 (Jiří Veltrusky)、朱莉叶·诺瓦科娃 (Julie Nováková)、伊万·珀尔道夫 (Ivan Poldauf) 等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小组成员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小规模变动是小组正常“运转”的结果, 那么大规模的变动则是不幸的, 是无法避免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致。比如, 1940 年政府的第 136 号指令, 就是针对文化机构里的犹太成员的。根据该指令第 1 部分, 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在一份自己不是犹太人的声明上签字。一份成员的名单对比显示 “33 个成员没有签署这一声明” (Čermák-Poeta-Čermák, 2012: 373)。从这个角度来看, 纳粹占领的开始, 可以视为小组一个重要时代——在有些人看来是最重要的时代——的结束 (cf. Toman, 1995: 243)。